

揭开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之谜

——兼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罗德运

印刷术、纸、火药、指南针,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17世纪初,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主要著作《新工具》一书中就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面貌……引起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①后来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也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②这是中国对整个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然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却长期是一个令中外学者困惑的难解之谜。自赵宋以降,千余年来,数以百计的学者聚讼不休,迄无定谳。以往学者研究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年代,多以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只字片言为依据而下断语。如据《后汉书·张俭传》的“刊章捕俭”之“刊”字,以为起源于东汉者;据《颜氏家训》的“江南书本”之“本”字,以为始于六朝者;以《隋书》的“文帝敕度像遗经,悉令雕撰”之“雕”字,以为肇始于隋代者。除上述“东汉”、“六朝”、“隋代”诸说之外,尚有“晋代”、“唐初”、“唐中”、“唐末”、“五代”等多种论说,每种论说的提出者都有其论说成立的依据,令人莫衷一是。

国外研究中国印刷史功力甚勤者,当推美国学者卡特。卡特在其专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谈到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年代时说:“最近似的年代,大致当在唐玄宗时(712—756年),正是中国国势最盛、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卡特氏的“盛唐说”是否成立姑且不论,其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征引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作了简明而又全面的论述。是书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个中译本,均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③。

张秀民先生是国内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大家。他根据明邵经邦《弘简录·唐长孙皇后传》中“令梓行之”之“梓行”一辞,提出雕版印书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据《弘简录》云:长孙皇后崩,“上为之恸,及官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论汉使外戚预政,马后不能力为检抑,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舍本恤末,不足尚也。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④

然而,对此论据提出质疑和驳议的,亦大有人在。胡适是最早对邵氏记载表示怀疑的学

者。就在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问世不久,胡适就撰文提出质疑:“《弘简录》这段话是明朝人看惯了刻版书,无意中说出梓行的错话……这一句十六世纪的无心之误,绝不是七世纪的证据。”邵氏何以犯无心之误,说出“梓行”的错话,胡适语焉不详,又给人们留下了疑问。罗继祖是又一个对邵氏记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1978年,罗继祖在《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上撰文说:“长孙后著《女则》,死后,太宗见而赞叹,谓可垂后。新旧两《唐书》记载略同,赞叹之后无下文,不知邵氏‘令梓行之’四字依据何来?正史既不见,疑出野史。邵为明中叶人,所见唐野史未必多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广搜野史,李唐一朝最为繁富,但《通鉴》载长孙后著《女则》,仅云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不云梓行。如《女则》经太宗特旨梓行,后世无论公私载籍,不应缺而不书,书经梓行,比抄本更便于流传,何以《女则》至今不见一著录,又无只字遗留耶?张谓‘《弘简录》乃正式通史,作者费十五年功夫四易稿始成,可见下笔谨慎不苟’,又谓‘究与笔记小说等随便说说不一样,所以还是比较可信。’此羌无故实之浮言能令人深信不疑耶。”^⑤否定了张氏的唐初贞观说。

1989年,张秀民在新著《中国印刷史》一书中,再次以《弘简录》“令梓行之”句为论据,并另以唐冯贽《云仙散录》中有关玄奘“印普贤像”的记载为旁证,而一仍前说。

中国印刷术到底起始于何时,长期以来竟成了一个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虽然多数学者倾向起始于唐代,但并没有列举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论据。在倾向于唐的观点中,又具体涉及到有唐一代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历史时期,令人眼花缭乱。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却弄清起始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因此,揭开中国印刷术起源的斯芬克司之谜,确定起源的具体年代,我们应向世人提供一份毫不含糊的答案。

近读曹之教授新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急切欲言:这是一份理想的答案。掩卷深思,上述遗憾也顿觉纾解。该书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余字,书前有唐至元书画印本插图8幅,明铜活字版插图1幅。装帧美观、大方,塑膜封面,色彩淡雅。“印刷术曾经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从她那遥远的发源地流淌出一条金色的河。让我们逆流而上,作一次艰难的旅行,去揭开发源地那神秘的面纱……”封面书名下寥寥数语题识辞,颇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读完全书就会发现:这是一部资料博泛、思路清新、方法新颖、见解精深的学术著作,这是一部揭开了中国印刷术起源的斯芬克司之谜的著作。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开篇以“众说纷纭”为第一章名称,列举了古今中外研究中国雕版印刷起源的各种观点,汇集了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及其提出这些观点的主要依据。纵观各家观点,无不是或建立在文献记载中的孤立的书证上,或限定在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上,于是爬梳最早的文献记载和探寻最早的印刷品,就成了研究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的两种主要方法。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研究在较长的时间内未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能不说与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关。另一方面,各种观点的提出,也说明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的繁复,以至成为中国印刷史中最有争议、最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在这里,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将是实现理想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中国印刷术起源的客观历史是一个不可变更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用什么方法,把这种历史的客观存在表述和再现到何种程度的真实,则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了。

开拓思路,将中国印刷术置于中国文化的座标上,求实创新,运用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研究方法,从广阔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是《起源》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在开拓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多有突过前贤之处,既不像前人那样将研究范围局限于造纸、印章

上,也不像前人那样抱住古文献记载的片言只字不放、咬文嚼字作文章,而是把印刷术放在历史的大气候中考察,上下左右、四方八面地进行全方位的论证。作者除用一章的篇幅着力于雕版印刷的物质基础——纸、笔、墨的研究外,还注意到了与雕版印刷起源有内在联系的方方面面,举凡文学、教育、书业、印章、宗教、外交、染织、货币等等,分多个章节一一详加论述,把印刷术的发明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广泛联系之中,惟其如此,才能对所揭示的问题有深刻的把握。有些内容,诸如宗教、外交、染织、货币等,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雕版印刷并无多大关系。但实际上,它们与雕版印刷起源的内在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作者把它们视作揭示印刷术起源的“新大陆”,试图从各种社会活动、文化现象与印刷术起源的对照中,找出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这些问题的论述,表现出了作者的科学见识和学术眼光,尤其值得称道。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考证法外,还运用了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研究法等现代方法。通过开拓印刷术起源研究的新思路,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与印刷术起源有内在联系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才能写出超越前人和他人水平的著作。

《起源》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是一个难得的开拓。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的初衷是:开拓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引进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方法,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代说’,纠正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使‘唐代说’建立在科学的、无可辩驳的基础之上。”通过作者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目的。社会需求、物质基础、技术基础是印刷术发明的三者缺一不可的条件。就社会需求而言,作者列举了著者需求、读者需求、抄书者需求、书商需求、藏书家需求、外交需求、佛教需求等七个方面,分列四章论述,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各设一章论述。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图表直观、一目了然,《起源》将大量无序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系统化并具体为数字,制成图表,它们所反映的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这就在更深的层次上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在论述了历代各种社会需求、物质基础、技术基础之后,作者并没有匆忙地下结论,为便于说明问题,又将自先秦至唐历代社会需求、物质基础、技术基础三项细分成十四小项列表比较,将繁复的论说文字变成简单的数目字。数字显示:唐代对雕版印刷的社会需求,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迫切;唐代对于发明雕版印刷所需的物质基础的奠定,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牢固;唐代对于发明雕版印刷所需技术条件,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具备。由此观之,结论自然而成:唐代以前尚不具备发明雕版印刷的条件,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无疑。这一结论与那些仅凭对文献记载的片言只字所作的推断比较起来,显然更有说服力。

有唐一代长达290年,雕版印刷起始于唐代哪一个时期呢?仅凭古文献记载的片言只字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而唯有将理论分析、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才能从更切近的意义之上对其作出阐明和确认。理论分析贯穿于全书,此不赘。作者高度重视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前已述及,张秀民根据邵经邦《弘简录·唐长孙皇后传》“令梓行之”,提出雕版印刷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年。《起源》作者不惜篇幅,对“令梓行之”详加考辨,校勘《弘简录》原文,从该文引据的旧、新两《唐书》中的《长孙皇后传》的原始材料分析,所谓“令梓行之”的记载属无中生有,从而否定了“唐初贞观说”赖以成立的一个重要例证。“唐中说”的主要依据源于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句中的“模勒”一词,释“模勒即刊刻”,为众多名家所征引,似成不刊之论。《起源》作者从元稹原文的上下文语言环境、当时的社会风气、白居易本人的记载和唐代文人作品的流传等四个方面论证,否定了“模勒即刊刻”之意。唐末已有不少印刷品行世,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当在此前,无须费辞。

古文献记载的论证既不充分,就无法确定印刷术起源的具体时间,考察实物遗存就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了。从出土文物看,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之间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武则天在位期间(684—704年)刻印的《妙法莲华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件印刷品。二经卷上虽皆未注明具体的刻印年份,但在经文上却都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时创造和使用的几个特殊字样,可作为武后在位时印刷的论证。按学术界对唐代历史分期的习惯方法,高祖武德到玄宗开元前称为初唐。由此可以断定,雕版印刷起始于初唐。“唐初说”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结论既已产生,但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还多方寻找雕版印刷的旁证。图书数量的剧增、私人藏书的繁荣、书目编纂的兴盛、官方赐书的猛增、书业贸易的发达、图书亡佚的骤减,凡此种种,无不与印刷术的发明有着重要的联系。虽然,对上述诸端的发展变化施加影响的因素是多个方面的,但是比较而言,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私人藏书的繁荣,书中一一列出各代藏书家,自先秦至宋,其姓名、字号、生卒、籍贯、藏书数量等可考者,计有先秦3人,汉代7人,三国8人,晋代7人,南北朝59人,隋代3人,唐代87人,五代27人,宋代311人,凡512人。如果说南北朝藏书家数量的大增是由于纸张的普及的话,那么宋代藏书家的大量涌现则应归功于唐朝雕版印刷的发明。再如书目编纂的兴盛,书中列出汉代至宋代书目共228种,其中两汉魏晋24种,南北朝42种,隋唐五代58种,宋代104种。宋代位居榜首,几近总数的一半。此之说明,雕版印刷发明于唐,至宋而普及。又如图书亡佚的骤减,书中分析了历代图书亡佚情况,据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私纂书目著录可知:先秦到两晋佚书最多,南北朝至隋唐次之,宋代最少。有唐代雕版印刷发明的前因,才有宋代图书亡佚骤减的后果,等等,它们都可作为考察印刷术起源的旁证。作者仍没有就此满足,他还把视角伸向国外,考察中国印刷品流入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最早文献记载的时间,研究国外的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代。事实表明,中国印刷品流入国外的时间和国外最早印刷品的刻印时代都是在李唐一代。这也可作为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的一个旁证。这种全方位的考察、综合性的纵深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比较接近于实际,符合历史的真实。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印刷术的起始阶段,由雕版印刷而活字印刷而套版印刷,渐臻完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弄清中国印刷术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源》穷流溯源,对之进行考察、分析、论证和比较,力求得到准确的结论,向世人提供了一份理想的答案。当然,《起源》也并不是没有可誉之处。全书以雕版印刷开篇,以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为殿,既研究了雕版印刷的起源,又研究了活字印刷的起源和套版印刷的起源。但后两者的篇幅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与雕版印刷术的研究相比较,论述未免过于简略。在论述雕版印刷起源问题时,连篇累牍地征引文献记录,备载某朝某代某人某书某篇,虽给人以证据确凿之感,又不免有繁复之嫌。瑕不掩瑜,《起源》是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它对揭开中国印刷术起源的斯芬克司之谜所作的贡献,已为学界所注目。

① (英)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③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是书文言文译本题名为《中国印

刷源流史》,刘麟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④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⑤ 罗继祖:《印刷术创始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第332页。

(责任编辑 吴永明)